



剖析当代符号学发展的重要展面

梳理皮尔斯符号学与传播学共享的源头

厘清其手稿中两者之间的历史勾连

再现皮尔斯传播符号学遗产的当代价值

中国符号学丛书

从书主编

陆立立

胡易容

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Charles S. Peirce and
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

赵星植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助 (编号: 2016M602680)

中国符号学丛书 ◎ 丛书主编 陆正兰 胡易容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剖析当代符号学发展的重要展面

梳理皮尔斯符号学与传播学共享的源头

厘清其手稿中两者之间的历史勾连

再现皮尔斯传播符号学遗产的当代价值

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Charles S. Peirce and
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

赵星植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喻 震
责任校对:陈 蓉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 赵星植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 5

(中国符号学丛书 / 陆正兰, 胡易容主编)

ISBN 978-7-5690-0652-0

I. ①皮… II. ①赵… III. ①传播学—符号学—研究
IV. ①G206②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9674 号

书名 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Piersi yu Chuanbo Fuhaoxue

著 者 赵星植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0652-0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8.75
字 数 32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这场华丽的双人舞才刚开始

——序赵星植《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赵毅衡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所长

正当今日符号学走近传播学，正当传播学也走向符号学，正当建立“传播符号学”呼声争相出现，这场双人舞跳到花式翻新而又意兴浓烈，正当我们惊叹舞者之默契时，我们忽然发现：它们原来是孪生兄妹。一百多年前，在它们孕育之时，就是同卵细胞。医学上说，这种孪生出自同一个受精卵，接受完全一样的染色体和基因物质，因此它们性格相同，就像一个模子打印出来的，有时甚至连自己的母亲都难以分辨。同卵孪生儿不太可能是龙凤胎，但是在我们眼前出现的这一对舞者，就是不太可能中的奇迹。符号学与传播学，近些年来我们看着它们互相走近，又张臂分开，但是我们知道下一个动作它们又会靠近。

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吗？传播学与符号学本为一体，这个问题已经被菲斯克等无数人说得确凿无疑，但是在学科实践中二者若即若离，分比合久，聚少离多。实践中的符号学变成了文科的普遍方法论，实践中的传播学几乎成了舆论社会调查的同义语。一百年来，符号学与传播学，各自远走天涯，常常不通音问。

然而，在开始时，在时间的出发点上，在逻辑的起始点上，二者却是合一的，只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赵星植这本书用切切实实的文献考证告诉我们，这一点就体现在皮尔斯的学说中：皮尔斯著作宣布了二者共享的源头，以及它们共同的基因，那就是同卵双胞胎最早孕育的地方。

为什么这个同源现象一直被人忽视呢？赵星植描述了发生在传播学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原因：“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原先的意义是“交流”，皮尔斯及其后继者芝加哥学派，都集中讨论“交流”这个意义，这时与符号学的关系还清晰可循。直到“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在20世纪30年

代兴起之后，“传播学”（communication studies）成了“大众传播研究”的简称，社会调查以及大众传播工具（报刊新闻、电影电视等）效用的研究成为其主要内容。如果说在英文中这至少还能让人看出原词原意，在中文中，“传播”的“播”字则完全遮蔽了“交流”的原意。无怪乎拉尼根（Richard Lanigan）努力重起炉灶，试图建立一门“交流学”（communicology）。

在 20 世纪的头 50 年，符号学过继到别人门下，那里有一位年龄相仿、名字易混淆、性情却很不相同的表兄弟，索绪尔的“*semiologie*”。符号被认为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是意义的承载物，任何意义必须依靠符号才能被传送、被解释，因此符号学就是意义学。但是在索绪尔那里，“符号学是对符号的研究”，而不是对人类所有意义行为的研究。符号学成为一种如此有效的方法论，以至于万物成为这把锤子敲打的钉子，成为适合问题的答案。这是对符号学过于狭窄定义的自然回应。幸好 20 世纪最后 20 年，符号学回归到皮尔斯的道路上，重新变成了一个意义哲学问题，成为意识的本体论。

当符号学与传播学都已经发展了一个世纪，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比较好？这问题不能取决于历史怀旧，甚至强调二者能充分互相吸取营养而得利也只是一时权宜的、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从更深的哲学层次上说，这二者的关系之紧密，远远超出互相之间实际利益的需要。赵星植的这本书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二者的关系深刻得多，它们本是哲学上过程与目的的关系。

在符号中展开的意义活动，不是一种自然活动，而是人类意识存在于世的基本方式。符号学的思考并不是为了解释自然，而是为了解释意识如何借意义而存在于世。哲学符号学解释意识与世界的联系，即意义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取得三种效果，即构成意识，在个人意识中如何积累成经验，在社群意识中如何沉积为文化。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承载：所有的符号都是用来承载意义的，没有任何意义可以不用符号来表达。因此，符号学着重研究的是意义的过程，而传播学着重研究的是意义的目的：人际交流。驱动符号意义的过程的目的性，是为了弥合符号发送者感知到的存在于他和接受者之间的认知差，因此，符号活动的目的就是交流传播。

目的论思想是一种用目的（希腊文“*telos*”）或目的因，给自然提供统一解释的哲学学说。目的论思想主张一切作用型的关系和过程都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律，所有的秩序和规律都符合某种内在的目的。因此，符号意义与交流传播二者的关系，就是过程与目的之关系。维纳与香农的理论已经指

出，现代传播的根本理论就有个目的论作为根本之法，因为控制论的基本点，就是需要反馈来调节过程。

但是赵星植给我们更强有力的证明：在皮尔斯的论述中，他已经都看到了符号与交流之间的目的论关系。在皮尔斯的学术活动之初，1865年他26岁时，他的符号学理论尚未成形，就写了一篇名为《目的论逻辑》的文章，提出“客观符号学”（objective symbolistic），认为“再现与其对象之关系”就是一种目的论。因此，皮尔斯符号学的出发点就是以目的论为驱动的。

此后半个世纪，皮尔斯一直在完善符号学，也一再强调符号学的目的论。皮尔斯的思想中特别接近维纳的“控制目的论”的，就是他认为任何符号交流都无法摆脱的“试推法”：符号意义经常必需用试推法解释，试推之所以是可行的，是因为它满足“人类心灵与真相亲近”的目的。只有通过试推，我们才能引入新的观念或新的“事实”，并由此开启探究之旅。试推是以目的论为驱动的反馈思考方式，目的是增加我们“猜对”的可能性。这一切的指向是有预定目的的，就是考察符号之解释项的最终归属，也即皮尔斯所谓的“终极解释项”究竟在何处的的问题。

一切都与目的相关，这个目的就是“真”。皮尔斯进一步指出，符号能表达真相，既是符号表意的本质目的，更是人追求意义的本质动力。关于前者，皮尔斯说：“符号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就是把真相带入表达之中。”而后，他将这一观点进一步表述为：“符号的目的就在于表达‘事实’，它把自己与其他符号相连接，竭尽所能，使得解释项能够接近完全的真相，或绝对的真相，也即接近真相的每一个领域……‘真相’实际上不是抽象的而是完整的，它是每个符号的最终解释项。”

这就是符号学与传播学结合的关键点，这就是符号传播学能在目的论上站住脚的根本原因：传播是为了传达“事实”之真，是为了让受众接受有意义的文本。这是符号学与传播学接近的基因根据，是二者合一的根本原因，它们实际上是同一过程中的重点不同而已，是同一舞曲中踩的舞步不同而已。我们可以翻用康德名言的句式：无过程的目的是空洞的，无目的的过程是盲目的；脱离符号的传播交流是落空的，而脱离传播交流的符号活动是盲目的。

由此，传播目的反馈给符号过程，符号意义过程协调于传播目的，这是一个维纳反馈控制目的论的精彩妙例。我们不再惊异于眼前双人舞之精彩：我们可以预视这二者的互动远远没有结束，并期盼看到更紧密配合的华丽演出。

全书皮尔斯文献引用规则

本书采用国际皮尔斯研究的引用与缩写惯例，在引用皮尔斯相关的手稿与论文时，以缩写代码的方式直接标注在正文中所引内容之后。本书尽量选取国际权威或常用的皮尔斯手稿来源。而对于所引用的其他文献，依然采取脚注的形式标示。

以下是本书常用的皮尔斯手稿来源以及缩写规则说明（具体文献来源说明参见本书附录“参考文献”部分）：

1. CP volume. paragraph, 即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ume x, paragraph y; 例如, “CP 1. 259” 即为哈佛八卷本《皮尔斯文献》第 1 卷, 第 259 段。这是本书最主要的手稿来源。

2. W volume:page, 即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A Chronological Edition*, volume x, page y; 例如, “W 1: 79”, 即为《皮尔斯作品编年合集》第 1 卷, 第 79 页。

3. EP volume: page, 即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volume x, page y; 例如: “EP 1: 165”, 即为《皮尔斯精粹: 皮尔斯哲学作品选集》第 1 卷, 第 165 页。

4. SS page, 即 *Semiotics and Signific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 S. Peirce and Victoria Lady Welby*, page x; 例如 “SS 132”, 即为《符号学与表意学: 皮尔斯与维尔比夫人通信集》, 第 132 页。

5. 除上述四本之外, 本书其他皮尔斯手稿文献主要来源于如下几本书: 詹姆斯·李斯卡的《皮尔斯: 论符号》(James Jakób Liszka, *Peirce on Signs*); 胡珀斯编的《皮尔斯论符号: 皮尔斯符号学论稿》(James Hoopes, *Peirce on Signs: Writings on Semiotics by Charles Sanders Peirce*, 1991); 博格曼与帕沃拉所编的网上词典《皮尔斯术语的共同心灵词典》(Mats Bergman & Sami Paavola, *The Commons Dictionary of Peirce's Terms*, 2003) 以及布赫勒编的《皮尔斯哲学著作》(Justus

Buchl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1955)。

6. 上述四本书籍中部分引用来自于皮尔斯未出版文稿，对此本书直接标出理查·罗宾所编辑的《皮尔斯作品注释目录》以及增补目录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Paper of Charles S. Peirce*, 1967, 1971) 中为这些段落所编辑的手稿编号，并简写为 MS。

目 录

引 论 皮尔斯与当代传播学研究	(1)
第一章 重访皮尔斯	(18)
第一节 皮尔斯符号学概述	(18)
第二节 重构皮尔斯的传播符号学	(39)
第二章 符号、信息与意义	(50)
第一节 符号与符号过程	(52)
第二节 信息及其认知	(63)
第三节 意义及其不确定性	(70)
第三章 三元符号传播模式	(79)
第一节 皮尔斯关于传播的早期表述	(79)
第二节 皮尔斯三元符号传播模式	(82)
第三节 三元模式与其他传播模式对比	(89)
第四章 符号自我及其互动机制	(104)
第一节 传播学视阈中的自我问题	(104)
第二节 “我错故我在”：自我的来源及特性	(108)
第三节 自我的符号本质及其互动特性	(115)
第五章 符号传播与社群的形成	(126)
第一节 皮尔斯“探究理论”概述	(127)
第二节 符号传播与探究社群的形成	(134)
第三节 “探究社群”之特性及其影响	(140)
第六章 皮尔斯与其他传播学哲学思想家之关联	(146)
第一节 米德与皮尔斯	(146)

第二节 莫里斯与皮尔斯·····	(166)
第三节 菲斯克与皮尔斯·····	(184)
第四节 哈贝马斯与皮尔斯·····	(199)
第七章 元媒介语境下的皮尔斯传播符号学·····	(219)
第一节 元媒介时代的符号传播及其特性·····	(219)
第二节 社交媒体的符号构成及其功能·····	(231)
第三节 虚拟现实技术：新日常生活回归“以身为媒”·····	(239)
结 语·····	(247)
附录：传播符号学学者访谈录·····	(251)
专访延森：三重媒介与符号传播·····	(251)
专访班科夫：数字时代与符号消费·····	(257)
专访皮特里宁：皮尔斯符号学及其三分模式·····	(266)
参考文献·····	(277)
后 记·····	(288)

引 论 皮尔斯与当代传播学研究

据我所知，我是对被我称为“符号学”的科学进行清理与拓展工作的先驱，但我更宁愿称自己是一位“边远乡巴佬”。……相应的，作为最先触及该领域的人，我不得不将我的研究限制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CP 5.488)

——查尔斯·S. 皮尔斯

查尔斯·S. 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这位美国思想史上传奇般的人物，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一个世纪。他所留下的数十万页手稿，至今还是整个学术界获取灵感的“思想宝库”^①。与其生前颇具悲剧色彩的窘境相比，自称“孤单”(CP 8.237)的皮尔斯已经不再孤寂，学术界用了近百年的时间来弥补在其生前对他的疏忽，对皮尔斯进行再发现，并在多个学术领域给予他“先驱”“奠基者”这样的称号。

皮尔斯传记学家费施(Max Fisch)曾给予他这样的评价：“到目前为止，美国思想界所产生的最具原创且多才多艺者是谁？其答案毫无疑问是‘查尔斯·S. 皮尔斯’，因为任何居其后第二位者都将被他远远甩开而不值一提。他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大地测量家、勘测员、制图师、计量学家、数理经济学家、终身的医学学习者、书评家、剧作家、演员、短篇小说家、现象学家、修辞学家和形而上学家。”^②

上述评价毫不为过。的确，从目前已整理出来的手稿资源来看，皮尔斯在多个学科领域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开拓性贡献。他对符号学所进行的原创性研究，成为符号学这门学科的基础，由此与索绪尔(Ferdinand de

^① James Jak6b Liszka: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Semeiotic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

^② Max Fisch: “Introductory Note”, in Thomas A. Sebeok, *The Play of Musem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7.

Saussure)一起被称为“符号学的奠基人”。他在思索符号诸问题的过程中,对符号传播、符号自我与社群关系诸问题的追问,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美国早期传播学研究特别是“符号互动论”的基础,并持续启发着当代传播学界对传播本质的探寻。

此外,他的思想还直接影响了如詹姆士(William James)、瑞恰慈(I. A. Richards)、杜威(John Dewey)、莫里斯(Charles W. Morris)、艾柯(Umberto Eco)、西比奥克(Thomas-A. Sebeok)、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菲斯克(John Fiske)等重要的符号学与传播学学者。至于当代传播学—符号学从皮尔斯处所受到的理论影响,笔者将用整本书来讨论。

在21世纪的今天,媒介技术的飞速进步以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促使传播学正逐渐从对传播现象的广泛研究,转向对传播学理论的系统整合与建构。与此同时,“传播符号学”(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作为一种理论整合范式,已经在海外形成一定的研究规模。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传播哲学思想也就是在此背景下逐渐得到符号学界与传播学界的共同注意。这是因为他从哲学思辨的高度,深入探究了传播之本质、目的以及动机等根本问题。这些讨论对当代传播学理论建构与拓展具有启示意义。回到皮尔斯这位符号学奠基人,深入探究其庞大的符号学体系中所蕴藏的传播学理论资源,不仅是推进理论符号学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传播学理论传统廓清与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必由路径。

本书在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提炼与再现皮尔斯符号学的传播哲学遗产。同时,本书还试图厘清皮尔斯符号学与当代传播学思想之间的历史勾连,以及他在当代所发挥的潜在影响,进而为当代传播学理论的纵深发展提供一个可参考的视角。

一、皮尔斯论“传播”

本书开篇需说明,“传播”这个课题是皮尔斯自己提出的。只不过他没有用“传播学”(communication studies)这一术语来概括他的工作内容。哈佛版《皮尔斯全集》第六卷专设一个名为“communication”的专题(CP 6. 158—162),整理了皮尔斯围绕“传播”这一概念所进行思辨的笔记。这表明皮尔斯的传播学理论是他本有的研究路径,而非后人对其思想所进行的传播学式的阐发。

更具体来说,皮尔斯的传播思想是其符号学的核心组成部分,更是其符

号学能超越结构主义桎梏，至今引领当代符号学思潮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皮尔斯的这一路径与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一脉相承，因为他认为符号学研究的最根本目的就是探究符号传播的规律与机制。阐明上述两者关系，可以明晰传播这一核心概念对皮尔斯思想体系的双重重要性，即它既对其符号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是其相关思想能与当代传播学发生对话与交流之根本。为此，本书开篇不得不好好说明这一关系。

首先，皮尔斯符号学的核心是“符号三元构成说”。这一学说决定了符号意义的生产与传播是其符号学理论的中心视阈。皮尔斯认为，任何符号都由再现体（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与解释项（interpretant）这三项构成。其中，再现体是符号的载体，对象是符号所代表的东西。而在这一组三元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解释项”这一项。解释项是在符号在解释者心中所创造的相等的或更为发展的符号^①，我们可以在广泛意义上将其理解为符号在解释者心中所产生的意义或思想。并且，皮尔斯认为“一个符号只有能被解释成符号才能成为符号”，而“不存在任何例外”（CP 2.308）。

这说明符号表意的核心环节在于解释者自身对符号意义的理解与解释。因为任何一个符号，无论它与其对象的关联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约定的，都必须以“在解释者心中产生一个解释项”作为必要条件，否则它就不是一个符号。换言之，任何一个事物都可能被视为符号，也可能不被视为符号，这取决于解释者是否把它当作符号来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解释者对符号意义的解释，又必然是面向传播与交流机制的。依据皮尔斯的理解，解释项是解释者心中所产生的新的符号，而这一符号同样可以产生新的解释项。这样一来，符号表意过程就是由一个符号到另一个符号，永无止境的意义延展行为。

为此，皮尔斯在《鲍德温心理学与哲学词典》中有关“符号”这一词条中说道：“符号是任何一种事物，它可以使别的东西（它的解释项）去指称一个对象，并且这个符号自身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指涉它的对象；解释项不停地变成新的符号，如此延绵以至无穷。”（CP 2.303）这表明符号意义的传播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假如解释者不主动停止解释，符号意义的延展将一直继续下去。因而，符号的意义为何，并且它将往何处发展，完全取决于解释者与符号发送者所组成的解释者社群对符号意义所做出的具体

① 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3~48页。

解释。

通过上述推演，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符号的意义并不存在于符号结构之中，而存在于解释者与发送者之间的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的能动性，对符号意义的解释起着决定性作用。正如延森（Klaus Bruhn Jensen）所述，皮尔斯从“解释项”这一概念所延伸出来的动态表意体系，使得人际交流与互动成为人类认知之关键。这使人类的探究过程转变成“带有现实意涵的交流与传播活动”^①。由此，符号学重点就从对符号结构的抽象探究，转向对符号意义的传播过程的分析，因为任何符号的意义都只有在符号使用者之间的传播过程中才能产生。

这样，“传播”不仅成为皮尔斯符号学的核心议题，而且也使他的符号学体系能突破结构主义的桎梏，继续引领 21 世纪的新符号学运动。在 20 世纪初期，皮尔斯与索绪尔几乎同时但又相互独立地创立了“符号学”这一门学科（皮尔斯称为“semiotics”，索绪尔称为“semiologie”）。二者分别创建的符号理论，代表着符号学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传统。

索绪尔把符号视为具有“能指”与“所指”的两面体，认为意义只能在系统与结构中产生，进而把符号学局限于语言系统之内。皮尔斯的符号体系则是三元模式。他对解释项及其传播机制的讨论，使符号学不再局限在结构的困境之中，预设了后来开放且多元的符号学新模式。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结构主义盛极而衰，索绪尔二元模式在符号学中式微。而在后结构主义时代，重新发现皮尔斯开放的符号学，就成了符号学的再生之路。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所有做出了成绩的符号学学者，无不重新回到皮尔斯所画下的蓝图之上^②。

同样，21 世纪的“新符号学运动”（new semiotics）^③发展的最前端，如“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伦理符号学”（semioethics）、“认知符号学”（cognitive semiotics）等，基本上都是

①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39 页。

② 赵毅衡：《回到皮尔斯》，载《符号与传媒》（第 9 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12 页。

③ 2014 年世界符号学大会的主题就是“新符号学：介于传统与创新之间”（New Semiotics: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从大会官方网站上也看出，各小组讨论的主题甚少涉及索绪尔式的符号学，以此可以作为 21 世纪符号学回归到皮尔斯所开创的“大符号学传统”的例证。请参见网页：<http://semio2014.org/en/home>。

在皮尔斯传播符号学模式上所进行的推进。这是因为新符号学运动与皮尔斯的初衷一样，都以探寻符号意义的传播与交流机制为基本任务。只是这些新的理论范式把研究对象从人与人的符号传播，转向人与环境界的符号传播，乃至整个生命界的符号传播^①。在此意义上说，“传播”不仅是皮尔斯符号学的内核，更是他的符号学能够替代索绪尔模式，并在当代保持理论活力之根本原因。

其次，从其符号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来看，“传播”更是连接整个皮尔斯符号学体系的桥梁和基石。皮尔斯把他的符号学按照符号、对象与解释项这三元关系细分为三个学科。第一个分支即“符号语法学”（semiotic grammar），主要关注符号的形式特性以及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个分支即“批判逻辑学”（critical logic），主要研究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即符号与其指称事物的关系（CP 1.559；CP 2.207）。而第三个分支即“普遍修辞学”（universal rhetoric），它处理的是符号与解释项的关系问题。皮尔斯沿用古罗马的命名传统，把该分支命名为“修辞学”，意指良好沟通与劝服他人的能力或行为。而沟通与劝服皆为最基本的人际传播行为，这显然是回到了传播这一概念的原初含义。关于这门学科的根本任务，皮尔斯认为是要“研究意义通过符号从一个心灵到另一个心灵，从一种心灵状态到另一种心灵状态所需之必要条件的科学”（CP 1.444）。“每个科学心智都遵循的法则（law），而这种法则使得一个符号产生另一个符号，特别是使一种思想产生另一种思想。”^②而皮尔斯的这一定义，显然已经非常接近于现代传播学的基本任务了。二者的主要任务都是要处理符号意义的传播规律与机制等问题。

皮尔斯赋予第三分支以极高的地位，他曾把该学说视为符号学体系中“最高且最活跃的分支”（CP 2.333），认为它将“导向最为重要的哲学结论”（CP 3.545）。他认为这是因为普遍修辞学可以为符号学的其他两个分支提供“修辞证据”（CP 2.333）。他坚持认为任何理论提出的概念必须要以修辞证据作为支撑，否则理论就是“不完善的”（imperfection）：“理论中所得出的推论、准预言都需要转而求助修辞证据”（CP 2.333），即以具体

^① 苏珊·彼得里利，奥古斯托·蓬齐奥：《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王永祥，彭佳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421~427页。

^② 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9页。

的实际观察来验证这些推论是否有效。

所谓“修辞证据”，是指通过对符号的具体交流与传播行为的考察，来验证符号学所提出的那些基本命题是否有效。“因为，假如符号学不能胜任传统修辞学所赋予的任务，那么它将不会是一个完善的学说。”^① 这表明，任何符号学议题的最终目的，都是回到符号传播的具体环节之中，探寻符号意义的根本传播机制。因此，符号学第三分支对符号传播问题的具体研究，就成了勾连皮尔斯符号学其他两个学科的关键。

从上述讨论可知，符号意义的生产与传播，实际上是皮尔斯符号学体系的内核与关键。皮尔斯对传播诸问题的重视，使得他的符号学模式能最终突破结构与系统的桎梏，继续引领当代符号学运动的发展。他从符号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把符号传播研究提升为连接符号学其他研究的关键，从而奠定了符号传播研究在其符号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这两点表明：皮尔斯的传播学思想，对于其符号学体系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样，皮尔斯对符号诸问题的研究，也会促进其传播学思想的发展。因此，皮尔斯的传播学与符号学思想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够割裂开来讨论。

二、皮尔斯与当代传播学研究

（一）皮尔斯与美国传播学之发轫

皮尔斯与当代传播学研究有着极深的渊源。他对符号与传播问题的诸多重要看法，直接影响着美国传播学研究在 20 世纪初的发轫，进而被视为当代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以及奠基人。只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皮尔斯作为传播学者的身份并未在传播学界得以清楚地论证。本书试图从传播学术史的角度说明皮尔斯相关思想与传播学理论发展自身有着最紧密的互动关系。

皮尔斯与当代传播学的联系，可以直接追溯到美国传播研究的发轫，即传播学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萌芽时期。当前传播学界多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切入，来讨论皮尔斯对传播学的这一重要影响。的确，芝加哥学派受到了实用主义思想的重大影响，正如胡翼青所言，“怎么评估实用主义

^① Mats Bergman: *Peirce's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The Rhetor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London: Bloomsbury, 2009, p. 138.

对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影响都不过分^①。皮尔斯作为实用主义的实际创始人，显然对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对象、理论取向与研究范式等方面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②。

然而，皮尔斯对当代传播学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实用主义，也不应当局限在实用主义。传播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皮尔斯与实用主义紧密关联起来，这导致当实用主义思潮退热时，皮尔斯也跟着实用主义淡出传播学研究的视线。实际上，皮尔斯手稿所蕴含的大量传播学原创思想，诸如他对“三元传播模式”“符号自我”“探究社群”等一系列重要传播问题的讨论，可以为当代传播学带来更加直接的启发，并且从根本上奠定了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早期传播学研究的理论雏形。

芝加哥学派之所以对当代传播学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奠基意义，是因为该学派学者们提早意识到传播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并且最早对美国社会中的具体传播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芝加哥学派认为，传播是人类关系的本质，传播建构并且维系了社会。正如学派代表人物帕克（Robert Ezra Park）所言，“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和传播而得以继续存在，而且还可以说是在传递或传播中存在着”^③。这一观点与后来以信息传递为主要思考路径的经验学派差异甚大。而由他们所奠定的“符号互动论”以及“社群主义”传统，从双向的符号互动角度探究传播、个体与社群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视角，至今还影响着当代传播学研究。在此意义上，传播学界普遍认为，芝加哥学派所开展的传播学相关研究并由此形成的相关理论，代表着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发轫。

甚少有人提及的是，皮尔斯对芝加哥学派之理论雏形的奠定，产生过直接且重大的影响。首先，皮尔斯与影响芝加哥学派启蒙的两位重要学者，即詹姆斯与杜威，关系密切。詹姆斯与皮尔斯是一生的挚友，更是把皮尔斯的实用主义思想进行广泛传播的关键人物^④。詹姆斯之所以在传播学理论史中

① 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② Peter Simonson: "Varieties of Pragmatism and Communication: Visions and Revisions from Peirce to Peters", in *American Pragmat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David K. Perry (ed.),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1, pp. 1-26.

③ E. M. 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198页。

④ 科尼利斯·瓦尔：《皮尔士》，郝长堃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3~44页。